

春融堂集

春融堂襍記

清·王昶 著

陳明潔 朱惠國 裴風順 點校

春融堂集

春融堂禠記

清·王 昶 著

陳明潔 朱惠國 裴風順 點校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春融堂集 / (清)王昶著;陳明潔,朱惠國,裴風
順點校. —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13. 7
ISBN 978-7-5535-0140-6

I. ①春… II. ①王… ②陳… ③朱… ④裴… III.
①王昶(1724~1806)—文集 IV. ①Z424. 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168524 號

出版人

王剛

責任編輯

熊雪芳 毛小曼 何智明

特約編輯

姜浩

封面設計

吳昊

書名

春融堂集

作者

清 王昶 著

陳明潔 朱惠國 裴風順 點校

出版、發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市紹興路 74 號

網址:www.cshwh.com

印刷

港東印刷有限公司

開本

890×1240 1/32

印張

44.5

字數

1200 千字

版次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國際書號

ISBN 978-7-55350-140-6/I·061

定價

128.00 元

敬告 如本書有質量問題請聯繫印刷廠質量科

T: 0512-59671164

點校說明

《春融堂雜記》^①，清代王昶(1725—1806)撰。王昶字德甫，一字琴德，號述庵，又號蘭泉，松江府青浦縣(今上海青浦)人。乾隆十九年(1754)進士，累官至刑部右侍郎。期間，曾先後隨軍征緬甸、平金川；屢奉命讞獄江南、湖北，隨駕西巡、謁陵、游寺等。其一生歷官所至，游蹤甚廣，曾“兩仕江西，一仕秦，三年在滇，五年在蜀，六出興桓而北，以至往來青、徐、兗、豫、吳、楚、燕、趙之境”^②。這些經歷，對於王昶開拓眼界胸懷、洞悉世俗民風、增長學識才智、陶冶心性情操等，無疑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正如時人在其傳記中評其一生游歷：“所過名山大川，皆足開拓心胷，增長識力，淳泓迤演，不名一家，可謂通儒也已。”^③

難能可貴的是，王昶在幾乎所有的行旅途中，都詳細紀錄山川形勢、風景名勝、氣候植被、古跡存佚、道里物產、民風習俗乃至途中與所到之地的人際往來等等，留下了豐富的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資料。“凡所經歷，必譔紀程”，從目前現存和見於著錄的王昶所撰行旅紀程來看，此話可謂毫不誇張。王昶生前自編《春融堂集》，已將一部分紀程之作收錄其中，如《游珍珠泉記》、《游龍泉記》、《游雞足山記》、《雅州道中小記》、《木耳占記》等。未收錄後來亦未刊印的，還有如《西陵扈從記》、《屬車雜志》、《豫章行程記》、《適秦日錄》、《滇詔紀程》等。

其實，王昶生前欲將全集付雕時，曾打算將紀程之作中“有關地

① 《春融堂雜記》，“雜”字原書作“禠”，係異體字，現仍保留其原貌，但在本《說明》中，則用通行的繁體字。

② 《〈金石萃編〉自序》，《春融堂集》卷三十七，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。

③ 李元度《國朝先正事略》卷二十“王蘭泉侍郎事略”，岳麓書社1991年版。

方利弊者”一併收入，但可能由於篇帙繁多，“終以掛漏棄置”；雖則還可采用“單行別刻”的方式，但“又以車馬倥傯，山川風景第志耳目所及，未獲如放翁、漁洋詳加考核爲病”^①而最終擱置，從中可窺見王昶對待著述所持的嚴謹態度。

王昶去世兩年後（1808年，清嘉慶十三年），其生前所撰的八種重要紀程之作，終於緊隨着《春融堂集》的先期問世而“次第付雕”，這八種爲：《滇行日錄》、《征緬紀聞》、《征緬紀略》、《蜀檄紀聞》、《商洛行程記》、《雪鴻再錄》、《使楚叢譚》、《臺懷隨筆》，總名之曰《春融堂雜記》。這些紀程之作的內容，皆涉及王昶“從戎、讞事、扈蹕、服官所歷之處”，其子王肇和認爲“其間記民風土俗，與夫賢士大夫之議論，皆足以廣當世見聞”^②。用今天的眼光來看，這些紀程之作還不只是起到增廣見聞的作用，其中很多記載，在歷史地理和歷史事件乃至民族、民俗、社會、經濟等方面，都有着寶貴的史料價值；很多對山川形勢和風景名勝的描繪細致生動、情景交融、文采斐然，一些詩歌作品緣於旅途見聞有感而發等等，都具有明顯的文學價值。

《春融堂雜記》可視作一部叢書，因其中每一部紀程之作都曾經單獨見於著錄，而且在卷帙的編輯上有所不同。據《述庵先生年譜》所記，《滇行日錄》和《征緬紀聞》都記爲三卷；《蜀檄紀聞》記爲四卷，《雪鴻再錄》記爲二卷，其餘《商洛行程記》、《使楚叢譚》和《臺懷隨筆》都記爲一卷，《征緬紀略》則未記入《年譜》^③。但在《春融堂雜記》中，每一種都不分卷，但按慣例都視作一卷。

整部叢書大體按紀程時間先後編次，始於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，止於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六日。以下對這八種書的紀程時間和主要內容分別作一簡述。

① 王肇和《〈春融堂集〉跋》，《春融堂集》，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。

② 王肇和《〈春融堂集〉跋》，同上。

③ 《述庵先生年譜》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條、三十六年辛卯條、五十一年丙午條、五十三年戊申條、五十六年辛亥條、五十七年壬子條，《春融堂集》後附，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。

一、《滇行日錄》：紀程始於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，止於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初五日。緣起於乾隆三十三年七月，兩淮鹽運使提引案發，王昶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職。時緬甸未靖，兵部尚書阿桂任定邊右副將軍奉命征緬，以素知王昶學識豐富辦事幹練，遂延請至軍營為幕僚，於十月初十日隨軍從京師出發，歷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貴州而抵雲南，詳記沿途水陸地形、山川風貌、民俗土風、市集景象、古蹟名勝等，至翌年三月初五日入騰越城止。其中因觸景生感所作詩頗多，為本書一大特色。

二、《征緬紀聞》：紀程始於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（有回敘三十三年事），止於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。時大學士傅恒任經略，阿里袞和阿桂任定邊右副將軍，於七月二十日自騰越出征，傅公帥兵五千八百人由戛鳩、阿里袞率水師下南大金江、阿桂狗猛密由江東，水陸並進征討緬兵。是役清緬雙方交戰延續至十一月，以緬酋懵駁以書乞降、雙方議和而正式停戰。本書以日記方式詳記每日行軍路線和交戰細節，隨文記及路途夷險與古跡勝景，偶有詩作。《春融堂集》卷三十七有“《征緬紀聞》自序”，略述此次出征緣起、經過及結局，並論其勝敗之因。此序本書未予收錄。

三、《征緬紀略》^①：本書是對元明以來中緬之間關係與征戰本末的總結性著述，重點記乾隆二十八年起到三十六年清緬之間的糾紛與戰事，最後記及乾隆四十一年平定大小金川之後緬甸對清政府“投誠進貢”，以及至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出現“南檄永寧”的局面。作者因親歷乾隆年間征緬戰役，對“緬事甚悉”，故本書的編纂緣起，正如作者在書末附言所云：“緬自元明來，數為邊患，頗恨二史於道里形勢、戰守得失之故不備。往者騰越知州吳楷撰《征緬紀略》頗詳瞻，亦有繁冗失實者，因次第刪正之，續以輸誠效貢，而緬事顛末始具，蓋使後之攷邊事者有鑒於此。”這也是本書編次於《征緬紀聞》之後的原因。

四、《蜀檄紀聞》：紀程始於乾隆三十六年九月，止於乾隆三十七

① 《征緬紀略》，“略”字原書目錄作“略”，正文作“畧”，係異體字，現統一為“略”。

年三月三十日。緣起於乾隆三十六年六月阿桂罷職，理藩院尚書溫福代之，復奏王昶留營佐助軍事；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發兵構亂，帝命溫福移師赴四川督辦，溫福請王昶隨行。九月二十八日自雲南永昌啟行，向東經趙州、楚雄、宣威等地進入貴州，再經威寧、畢節，北上過赤水河進入四川，再向北經永寧、瀘州、榮昌、內江、資州、資陽、簡州，於十月二十日抵達成都。此後，或西南至雅州府榮經，或西北進入汶川與雜谷廳，圍剿金川反清土司武裝。期間所記行軍、攻戰、調兵、軍糧等事甚詳，間記當地藏族民俗、衣著、語言等，也有一些與同僚往復酬唱的詩作。本書以王昶摘錄其復奏“進勦金川道路”一文結束，時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三十日，距清軍最後平定大小金川尚有四年之久，其原因則在文末交待，蓋此後“軍事益勞，連日夜治文書章奏，遂不暇爲劄記矣，故兩金川用兵，大略止於此”。

五、《商洛行程記》^①：紀程始於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八日，止於是年八月二十五日。緣起於河南伊陽縣民秦國棟等三十餘人戕害知縣孫岳灝後逃逸，時巡撫畢沅搜捕不獲，因奏言“伊陽壤接湖、陝，恐由熊耳諸山逃入商洛、鄖西諸處”^②；王昶時任陝西按察使，得旨派往督緝，於是先赴商州，以商州龍駒寨下接河南淅川，爲商民販買水陸要路，同時傳檄州官派兵巡察緝捕。本書除開首簡敘督捕事由外，終篇只記沿途所經地自然與人文之景。其中尤詳於藍田、商山、東巖山、武關、雒南城、山陽、甲河關等地歷史人文典故，所引歷代詩人詩作如王維、韓愈、白居易、張喬、賈島、李白、溫庭筠、邵雍、李本固等，引用歷代典籍如《國策》、《左傳》、《水經注》、《通鑑》、《酉陽雜俎》等，考古論今，因地及人或因人及地，以記行程地理爲主線卻又充滿濃厚人文氣息，是其一大特色。

六、《雪鴻再錄》：紀程始於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二日，止於是年十月二十八日。時王昶任雲南布政使，正以騰越城工修竣前往驗收途中，得旨改任江西布政使，遂先赴騰越驗城畢，於四月回到昆明。

① 《青融堂雜記》原書目錄題爲《商洛行程》，正文題爲《商洛行程記》，本書從正文。

② 嚴榮《述庵先生年譜》，《春融堂集》後附，嘉慶十二年塾南書舍刻本。

六月初五交印於新任後，於十二日自昆明啟程，晉京述職。途歷雲南、貴州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，入京師後再北行經懷柔、密雲抵達熱河，蒙兩次召見。隨駕自熱河啟程旋京後，又歷經河北、山東、江蘇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西，於十月二十八日抵省治南昌府就任。本書詳記每日行程與所見所聞，留意民瘼，對沿途各地居民貧困生活、遭遇水災現狀以及吏治腐敗現象等，皆如實記述并抒發強烈感慨。又記本次行程中登巴陵岳陽樓、武昌黃鶴樓、滁州望江樓，敘今古之變遷，嘆往時之不復。以“雪泥鴻爪”名書，其蘊意當源自於此。

七、《使楚叢譚》：紀程始於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三十日，止於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二十日。緣起於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等折色、重征諸弊，王昶受命與少司馬覺羅吉慶前往審理。自京師啟程，雖只歷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四省，然至案發地湘鄉讞事畢，於回程途中至湖北德安，復向西歷京山、鐘祥、荊門、荊州、公安等地，再入湖南經澧州、常德、龍陽、益陽又到長沙，然後自長沙再經湖北、河南進入直隸回到京城。蓋是時王昶已任刑部右侍郎，途中又獲命審辦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和折收草費案、江陵縣書吏包攬方家淵堤工偷減土方案、湖南永明縣民蒲太圻控告賄買武童案，以及長沙民王澤遠告知縣勒買常平倉穀案等。本書除記奉命審理諸案外，頗多記及地方弊政，如“河南、湖北郵政之弊”，湘鄉“折漕各弊，多非誣者”，荊州防汛城堤“當事者憚於疏鑿”，“中州年來河水安瀾，秋成多稔，而凋敝虧缺，出於常理之外”等等，并對“民之疾首蹙頞，實有不勝言者”表達了深切憂慮。亦記途中山水勝景、地方年登俗樂、殷實富庶之狀等。

八、《臺懷隨筆》：紀程始於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八日，止於是年四月十六日。本行程為乾隆帝第五次西巡五臺山，王昶隨駕同行。整個行程在河北與山西境內，於河北的主要活動為謁泰陵（世宗雍正帝陵寢），禮畢又謁泰東陵（乾隆帝母孝聖憲皇后陵寢）；於山西的主要活動為五臺山一帶游臺麓寺、白雲寺、殊相寺、鎮海寺、顯通寺、羅喉寺、菩薩頂、壽寧寺等，回程途中於河北境內又游崇因寺、廣惠寺、堯帝廟、宏恩寺等。本書除記錄以上游蹤所到之處外，所記沿途名勝古跡不下百餘

處，如“頗有南中之勝”的泉宗寺玉泉水；“極壯麗”的西頂碧霞元君神廟；“綿亘數千里，隱約雲際”的石經山支隴望海陀、泰湖嶺，抵東北谿途中的“荊軻邨、樊館山諸勝”；“峯巒層疊，爲關塞塞厄處”的紫荊關；“峯巒峭削，松柏秀鬱”的大茂諸山；“層巒疊嶂中”的石佛山、彈琴峽諸勝；“山桃作花殊爛熳”的靈應庵兩山之間；“氣象峻整”的龍泉關、長城嶺等等。因五臺山游寺禮佛活動主要集中在臺懷鎮，故以“臺懷”名書。

《春融堂雜記》除作爲叢書有不同版本外，又因其中每一種都可單獨成爲一書，故這八種書還分別爲其他叢書所收錄，使得子目也有了不同的版本。其中作爲叢書的版本分別有嘉慶十三年(1808)原刊本和光緒十八年(1892)補刊本，後者是在原版基礎上修殘補缺而成，故版式完全相同。此外，《申報叢書續集·掌故類》亦將《春融堂雜記》八種收錄爲一書，可稱叢書中之叢書。作爲單行本而被其他叢書所收錄的，有《昭代叢書》(道光本，以下簡稱“《昭代》本”)收錄兩種，《小方壺齋叢抄》(以下簡稱“《叢抄》本”)收錄一種，《小方壺齋輿地叢抄》(以下簡稱“《輿地》本”)收錄八種，《古今說部叢書》(以下簡稱“《說部》本”)收錄七種，《古今游記叢抄》(民國莫釐涵青氏輯，以下簡稱“《游記 1》本”)收錄一種，《古今游記叢鈔》(民國勞亦安輯，以下簡稱“《游記 2》本”)收錄一種等。以下列表說明各叢書所收錄的基本情況及其本身版本。

叢書收錄 情況 書名	《昭代》本 道光十三年刊	《叢抄》本 光緒六年排印	《輿地》本 光緒十七年排印	《說部》本 宣統三年和民國二年排印	《游記 1》 本民國三年石印	《游記 2》 本民國十三年排印
滇行日錄	無	無	第七帙	三集	無	無
征緬紀聞	無	無	第十帙	四集	無	無
征緬紀略	辛集別編	無	第十帙	五集	無	無
蜀檄紀聞	辛集別編	無	第八帙	四集	無	無
商洛行程記	無	無	第六帙	無	無	卷十二
雪鴻再錄	無	無	第五帙	四集	收錄	無
使楚叢譚	無	無	第六帙	四集	無	無
臺懷隨筆	無	卷二	第一帙	四集	無	無

以上各種版本，經比勘其實同出一源，都來自嘉慶十三年原刊本。但可能由於所據嘉慶原刊本在印刷質量上不盡相同，故還是存在一定的文字異同現象。特別是今存嘉慶原刊本有一些版刻缺字、明顯誤字以及文字漫漶之處，上述其他版本有的無此現象，故還是有一定的校勘參考作用。

本書的點校，以嘉慶十三年原刊本為底本，主要校以《昭代》本、《輿地》本和《說部》本，並參校其他各本。凡底本文字清晰且文義通暢者，一般均保持原貌不作校改；若底本文字清晰然文義乖舛者，參校他本並多角度考索獲得確證後，對底本誤字逕作校改。其餘如底本文字漫漶無法辨認、版刻缺字以及衍字、誤倒等現象，皆校以他本並考證其原委，若有確鑿證據，則據以作出校正。此外，本書中所涉異體字，一般均保留其原貌，但所用避諱字，皆逕改回本字。凡校改文字，一律不出校記或隨文校注。茲掇擷各類校改現象，舉例如下。

1. 底本誤字校改例

《征緬紀略》：“發威遠大礮，礮重三千斤，子三十餘斤，聲如奔雷，遇水輒洞以過，柵不為塌。”

按：明清戰爭中使用的“威遠大礮”赫赫有名，但若礮彈“遇水輒洞以過”，豈非如刀切豆腐般易如反掌，又何足稱道？檢校《昭代》本，此句文字並無不同；又校以《輿地》本與《說部》本，則皆作“遇木輒洞以過”。揆前後文意，此處所敘為“攻柵”之戰，古代之柵，若用以防禦工事，率皆以木為之。若礮彈於射程範圍之內能穿木而過，且“柵不為塌”，可見其射速之快與威力之猛，如此方值得書上一筆。考《清史稿》卷五百二十八·列傳三百十五·屬國三·采錄王昶此段記載，亦作“遇木輒洞以過”，則足證底本“水”為“木”之誤。其致誤之由，蓋因字形相似，而導致刻工誤識。據此，將底本原文“水”字校改為“木”。

《蜀徵紀聞》：“初九日晨，得桂制府書云：十二月二十七日攻取卡了，其郭松、甲本兩處亦計日可得。”

按：“卡了”，查無此地名。檢校《輿地》本，“了”字作“丫”；又校

《昭代》本與《說部》本，卻并作“了”。考《清實錄》之《高宗實錄》卷八百九十八載：“至僧格桑聞約咱已失，勢必固守卡丫。……俟東山梁礪卡一得，即速搭橋，克期前進直取卡丫。”此外《高宗實錄》尚有多處敘及其地，均作“卡丫”；又《清史稿》卷十三《高宗本紀四》載：“溫福奏攻克小金川曾頭溝、卡丫礪卡。”可見此地名應為“卡丫”，作“卡了”蓋因形近而誤。據此，將底本原文“了”字校改為“丫”。

又按：“其郭松、甲本兩處亦計日可得”，檢校各本，“甲本”均作“甲木”。考《清實錄》之《高宗實錄》卷九百一載：“四川總督桂林奏：督兵齊集甲木，合攻噶爾金，共破大小礪十一、石卡七。賊逃回東山梁屯踞，其甲木山后小路，賊布卡甚密，不能繞越進攻。”此外《高宗實錄》尚有多處提及地，皆作“甲木”；又《清史稿》卷十三《高宗本紀四》載：“丁未，桂林奏克郭松、甲木各礪卡。”足證此地名實為“甲木”，作“甲本”蓋亦因形近而誤。據此，將底本原文“本”字校改為“木”。

2. 底本漫漶校正例

《征緬紀聞》：“十三日，檄告猛駁，言緬既懼討，當如吳尚賢時納貢，送還□掠兵民，其木邦、蠻暮、猛拱土司遣還故地，毋得擾害。如奉約，當奏聞撤兵。”

按：底本於“送還”後一字漫漶，點校初稿辨識為“繫”，蓋以其“拴縛、拘執”之義附會下文“掠兵民”。然檢校《輿地》本該字作“羈”，而《說部》本則作“要”。“羈”和“要”的字形上部均為“西”，細辨原書漫漶之字，其上部果然依稀可辨“西”之形，由此可斷初稿作“繫”當出自臆測。“羈”，即“羈”之異體字，有“拘系”義，與“掠”連用，符合語義邏輯；“要”與“掠”連用，則表義乖戾，未見古人行文用例。由此，據《輿地》本將底本漫漶之字校正為“羈”。

《商洛行程記》：“望少習山，山勢嶙峋綿亘。……少習，即楚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□□，曰‘將通於少習以聽命’者也。”

按：底本於“大夫”下兩字漫漶難辨，點校初稿辨識為“十□”，蓋

以前字爲“十”，後字以缺字符代之。然檢校《輿地》本，此處兩字作“士蔑”。考士蔑爲春秋時晉國的政治人物，“士”爲其氏名，曾由晉侯親命爲鎮守陰地之命大夫。《左傳·哀公四年》：“楚人既克夷虎，乃謀北方。……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：‘晉、楚有盟，好惡同之。若將不廢，寡君之愿也。不然，將通於少習以聽命。’”由此知王昶記少習山典故源自於《左傳》，其人名爲“士蔑”確鑿無疑，遂據以將底本漫漶處校正爲“士蔑”二字。

3. 底本脫字校補例

《滇行日錄》：“十七日，自宜溝驛行。過淇水六十里，抵淇縣淇門驛。因憶門人景雲客人龍孝廉昔居此，今下世已五載矣，作詩弔之。赴汲縣途，□□□吳侍讀省欽自貴州典試回，下車絮語，風沙甚厲。”

按：底本於“吳侍讀”前空三字，但非同於古代表敬用例之“擲抬”（一般“擲抬”只須空一格即可），故疑有脫字。檢校《輿地》本，於“赴汲縣途”下有“遇同年”三字；又校《說部》本，則於“赴汲縣途”下爲“次得遇”三字。如此則當作兩種不同標點，一爲“赴汲縣途，遇同年吳侍讀省欽自貴州典試回”；一爲“赴汲縣途次，得遇吳侍讀省欽自貴州典試回”。尋繹此二文句，當以前者文意爲優，蓋以後者“途次”而言，乃多指旅途中住宿或住宿之處，不宜前有“赴”字；且聯上下文“下車絮語，風沙甚厲”之語來看，明謂尚在途中；再者，“吳侍讀省欽”即吳沖之，非但與王昶同年，而且還“生同鄉，召試同爲中書，出入同朝者四十餘年”，甚至生前即已預定由王昶爲其撰寫“志墓之文”（見《春融堂集》卷五十六吳省欽墓志銘），故王昶在此稱其“同年”，與事實及兩人關係均相吻合。此外，王昶此首贈詩，被收入《春融堂集》卷十，題爲“途遇吳侍讀沖之，即別時從貴州主試回京”，從標題“途遇”、“即別”來看，確亦與“途次”無關。由此，則據《輿地》本校補“遇同年”三字。

《滇行日錄》：“十四日，行四五里，登寶藏山，一名觀音山。行躋其顛，俯視羣山，若兒童然。相傳武侯南征迷道，遇一嫗呼犬從□□

中出，因立廟祀之，至今尚存，故哨亦以名。”

按：“遇一姬呼犬從□□中出”，底本此句中兩字空白，點校初稿姑以缺字符代之。後校以《輿地》本，此二字作“絕徑”，又校《說部》本，則作“石徑”。以此處所敘之地為“寶藏山”，且根據“武侯南征迷道”之史事傳說，可考得王昶所記之來源。據清初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一百十八“雲南六”記載：“寶藏山，在縣東七十里，一名觀音山。相傳武侯南征，至此迷道，遇一老姬，呼犬從絕徑中出，始得路。兵旋，建廟祀之，俗名‘娘娘叫狗山’。”稍早於顧祖禹的顧炎武，亦在其《肇域志》卷四十五（清鈔本）記錄了此條傳說；此後相同的記載，還見於清羅綸《（康熙）永昌府志》卷四、清鄂爾泰《（雍正）雲南通志》卷三、清許鴻磐《方輿考證》卷九十三、清李誠《萬山綱目》卷十七，以及清穆彰阿《（嘉慶）大清一統志》卷四百八十七等，且眾多的記載於本書所脫二字皆作“絕徑”。由此可斷《輿地》本此處文字正確，遂據以校補“絕徑”二字。

4. 版刻缺字考證例

《雪鴻再錄》：“二十八日，由清鎮行經高樹、鴨江諸塘，凡五十里，未刻抵貴州省治，李撫軍□□、吳學使壽昌及司道府縣皆來迎，遂徧拜之。”

按：底本於“李撫軍”下有兩字空缺，當係李撫軍之名或字號。檢校《輿地》本，亦為兩字空缺（書兩小圓點），又《說部》本則作兩個缺字符“□□”。按“撫軍”係清代巡撫之別稱，“學使”則“學政”之別稱。王昶此時“抵貴州省治”，乃乾隆五十三年六月，於堂堂一州之巡撫，豈會不知其名？考《（道光）貴陽府志》卷九“職官表”，於“巡撫”欄內乾隆五十年起列“李慶萊”，至乾隆五十四年改列“郭世勳”；又於“學政”欄內乾隆五十二年起列“吳壽昌”，至乾隆五十五年改列“陸湘”。又同書卷三“大事記下”載：“（乾隆五十年）十一月，以李慶萊為貴州巡撫。”原注：“慶萊以十一月初一日任。五十四年三月，以郭世勳為貴州巡撫。”可見，乾隆五十三年王昶行抵貴州省治所，與學政吳壽昌

一起前來迎接之“李撫軍”，實為李慶萊。其人《清史稿》未予立傳，但所任貴州巡撫，卻見於《清史稿》兩處記載，一為卷十四《高宗本紀五》：“（乾隆五十年秋七月）辛酉，以李慶萊為貴州巡撫。”一為卷二百二《疆臣年表六·各省巡撫》：“（乾隆五十年）七月辛酉，李慶萊代。五十四年，李慶萊正月丁亥卒，郭世勲貴州巡撫。”考李慶萊早在清代國史館就有傳記，清末李桓輯纂《國朝耆獻類徵》，於卷一百八十八“疆臣四十”錄其國史館本傳甚詳，其中即有記其於乾隆“五十年七月擢貴州巡撫”，且在此任上直至乾隆“五十四年卒”。顯然，可據此於“李撫軍”下校補“慶萊”二字。

《雪鴻再錄》：“二十日，行三十里至□地飯，猶許州境也。過郵亭廟，自是入新鄭。又七十里抵城，館于東門外城隍，即洧水也。”

按：“至□地飯”，底本於“地”前一字空缺。檢校《輿地》本與《說部》本，缺字相同。以王昶紀程各書之例，此處“□地”當係一地名。觀上文十九日王昶已到許州，次日即本段所敘行程，由許州行三十里至“□地”吃飯，再過郵亭廟進入新鄭境，又行七十里抵達新鄭縣城。由許州到新鄭，檢譚其驥先生主編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清代分圖可見，其行程途徑非常簡捷，即直面向北而行即可。考許州出城向北，行三十里有一地名叫“帳地”，見載《（嘉靖）許州志》卷一“地理志·村鎮”：“帳地鎮，在州北三十里。……各鎮俱有集。”此鎮地屬許州境，還設有里甲、社學、寺觀等，其寺觀名“洪山寺”，除見載於《（嘉靖）許州志》卷八外，還見載於《（乾隆）續河南通志》卷十七“輿地志·寺觀”。如此頗具規模之集鎮，行旅之往來，吃飯、住宿當無問題，故本段王昶記吃飯之地，當即此也。早年身歷康、雍、乾三朝之名宦甘汝來（字耕道，號遜齋，謚莊恪），因歷任廣西巡撫、左副都御史復署廣西巡撫，於雍正四年、五年間兩次往返京師與廣西，亦曾途經許州且在帳地住宿，留下《許州懷古用少陵玉華宮韻》詩一首，并賦詩《帳地鋪曉發用壁間韻》一首，俱見《甘莊恪公全集》卷一。綜據以上考索，本段之缺字為“帳”字無疑，當可據以校補。（該地今名“丈地村”，洪山寺尚存，

寺前殘碑尚有“隆慶元年”、“帳地鎮”等字樣。)

5. 底本衍倒校正例

《使楚叢譚》：“二十日曉行，頗寒。五十里過觀音河，又三十里至廣水店。”

按：“二十日”，底本原作“二十九日”。本書為日記體裁，觀上一段記“十九日丑初起，至武勝關飯。渡獅水，又四十五里至信陽州……”；下一段記“二十一日，過柳店，晚至楊店宿。僅行幾十里，以馬疲憊極，實不能行也……”，則中間不可能為“二十九日”。檢校《輿地》本與《說部》本，本段皆作“二十日”，則不僅前後日期順序相符，且前後所到之地亦合於行程，可證底本原文“九”當係衍字，故據以刪“九”字而校正為“二十日”。

《使楚叢譚》：“初七日，秋塍來見，即別。行五十里至衛輝，吳生增自絳州來，余君慶遠自開封來，小飲劇談久之。”

按：“行五十里至衛輝”，“衛輝”二字底本原作“輝衛”。此處為王昶記回程行至河南，上一日初六在“新鄉”宿夜，本日初七繼續向北而行，然“行五十里”所至之地絕無“輝衛”，且整個河南全省亦無“輝衛”，則顯然係“衛輝”之誤倒。檢校《輿地》本與《說部》本，皆作“衛輝”，是為底本誤倒之明證。更何況本段下文又記“懷慶知府署衛輝府同知葉大可來謁”，其中作“衛輝”不誤，是又為底本上文誤倒之本證，故據以乙正。

6. 避諱用字校改例

《滇行日錄》：“過江橋，江源一出羅次九漏山，一出和曲百花山，至此合流。橋建始于明萬歷年間，嗣後屢修屢圯，今以板為之，一名永豐橋。行四十五里許，即入山，盤屈上下。行三十里許，至梅子箐大慈寺，稍憩。寺舊名法崇，亦建於萬歷中……”

按：此段的兩處“萬歷”皆當作“萬曆”，蓋明神宗年號，清避乾隆帝名諱將“曆”寫作“歷”或“歷”，現逕予改回。本書除涉及年號“萬

歷”皆依例還改回“萬曆”外，尚有涉及曆法之“歷”，亦還予改回“曆”字。

《商洛行程記》：“又更始元年，析人鄧葉起兵攻武關，克之。”

按：“鄧葉”當作“鄧曄”。考鄧曄起兵事見《漢書》卷九十九下《王莽傳》：“析人鄧曄、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”，“曄自稱輔漢左將軍，匡右將軍，拔析、丹水，攻武關……”此蓋王昶避康熙帝名諱“燁”而連帶避“曄”字，現還予改回其本名“曄”字。

此外，本書中避諱字還較多涉及“邱”字，蓋雍正三年詔令避孔子名諱，凡“丘”字皆寫成“邱”。本書凡涉此諱字，現皆予改回“丘”，包括人名“丘仲”、“丘學敏”，地名“內丘縣”、“中丘驛”、“任丘縣”、“魚丘驛”，語詞“故丘”等。

以上校改之例，僅為各類情況之一二，此外尚有不少校改，亦皆持之有據，且力求證據確鑿。然盡管竭盡努力，本書仍有一些版刻缺字，未能考證恢復其原貌，只能姑且以缺字符代之，以俟將來。至於全書點校中定然還存在錯誤和不妥之處，則懇請專家與讀者隨時指出，不吝賜教。

目 錄

滇行日錄	001
征緬紀聞	026
征緬紀略	047
蜀徼紀聞	064
商洛行程記	094
雪鴻再錄	100
使楚鼓譟	121
臺懷隨筆	135